

龙泉山，浙东文明的高地

乡愁

罗 明

龙泉山位于余姚市城区中心，在平地间突兀而起，很久以前乃海中一岛，故曾名屿山。龙泉山的得名，源于山腰间的一口井，其水色绿如猫眼，且终年不断。相传宋高宗赵构临此饮水，感觉泉水甘甜美口，取小髻汲水而去，并谓水好风景好。与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诗句相呼应，故取名“龙泉”。

龙泉山一带的发展，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物质资源。余姚地处长三角南翼，宁绍平原中间点，姚江穿县城而过，东流入海。姚江古名舜水，据传与舜有关，著名史学家史树青教授曾为余姚题名“姚墟古迹”。姚东有举世闻名的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，出土文物充分展示了那时的灿烂文化。城区通济桥以东是重要的海陆物资交换的内河港口，原有天妃宫，在今玉皇山南，后称天后宫，供奉渔民信仰的妈祖。姚江与候青江交汇处的三江口海产品市场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消失。姚城也是南部山区与北部平原人员交往的场所，平原“二白一黄”（棉花、海盐、稻谷），城区各工场制作的生活用品、加工食品、生产用具等，山区的“木竹笋茶”，均在此交流买卖，互通有无。余姚还是中西文化的碰撞点，余姚的瓷器、茶叶和手工制品深受海外人士喜爱，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的活跃，也促进了中西人员交往与文化交流。

便捷的水运、繁荣的集市、开放包容的民风、稳定富足的社会，吸引了不同时期的移民。外国海造陆，内围湖造田，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供给总量，也滋养着历代百姓。南入四明山、北上杭州湾、东渡海岛及邻国可以避乱，回平原水乡仍可正常生活，进退自如的地理环境利于优秀人才的保护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。特别是明清时期，余姚人才辈出，仅明朝就出了三任状元，中国古代的十大思想家，出生于余姚的就有王阳明、黄宗羲二位。号称“日本孔夫子”的朱舜水也是余姚人。

优越的地理位置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赋予了余姚“文献名邦”称号，也成就了龙泉山，丰富了山中文人景观，并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。

龙泉山是一座文化山、历史山。山南麓有一古刹，名为龙岩寺。此寺始建于公元336年，仅迟于杭州灵隐寺10年。其东邻朱氏宗祠，为朱之瑜先祖祠堂，现为朱舜水纪念馆。山北麓迁建始建于北宋的楞星桥和元代的舜江楼。山东麓大门进口处有高大的石碑坊。山西麓迁建清四明阁，并有当代建成的余姚博物馆、园

林广场等。从公园南门至第三平台石壁处，可见清书法家翁庆龙所书“文献名邦”巨匾。位于山南腰的中天阁，始建于五代，曾为王阳明先生讲学处，清建有龙山书院，现为阳明书院。山上另有龙泉惠室、知乐池、文昌阁、祭忠台、乡贤祠以及造型奇特的纪念亭、纪念馆(碑)等。

其中，祭忠台是龙泉山上一处特别的景点。相传明朝正统年间，翰林侍讲刘球被宦官王振所害，余姚人成器邀集志同道合者，以龙泉山绝顶石为祭桌，放上全鸡好酒，含泪遥祭刘球。后来人们就把这块石头叫祭忠台。遥想当年，先儒黄宗羲少年时，用藏在袖内的铁锥追刺宦官许显纯，气势威震朝野。处于山南半坡处的孙忠烈祠内，介绍了横河孙家几代人为国尽忠、为家尽孝的可歌可泣故事。龙泉山，见证了余姚人的风骨，余姚人的气度。

龙泉山，也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山。唐代大诗人方干有《登龙泉山绝顶诗》：“未明先见海底日，良久远鸡方报晨。古树含风常带雨，寒岩四月始知春。中天气象星河近，下界时丰雷雨均。前后登临思不尽，年年改换往来人。”此诗写出了龙泉山的佳景，又富有哲理。山上的中天阁，名字出典于此。北宋名相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，应余姚县令谢景初的邀请，曾多次登山作诗，其中《石井》一首道：“山腰石井千年润，海眼泉无一日干。天下苍生待霖雨，不知龙向此中蟠。”而明代王阳明的一首《忆龙泉山诗》：“我爱龙泉山，山僧颇疏野。尽日坐井栏，有时卧松下。一夕别云山，三年走车马。愧杀岩下泉，朝夕自清泻。”更是对龙泉山直抒爱恋之意……本人也凑了一首《余姚龙泉山》：“世居姚城二千零，林木葱郁舜江邻。玉液甘井名南来，龙泉古寺始东晋。朱氏宗祠之瑜话，中天阁楼守仁心。贤踪史迹闻天下，亭台曲径览胜景。”权作抛砖引玉之作。

龙泉山，又是一座与我有缘的山。记得1975年秋读高中时，学校组织登游，从东门进，沿着石阶而上，途经名亭古建，中有大树蔽日、篱笆葱茏，又遇野藤附树枝、苍苔寄老墙，只见贤踪史迹，气度非凡。至顶俯瞰姚城，一览无余，东望舜江楼，古朴典雅，通济桥，长虹横卧，气势恢宏。南眺四明山，逶迤起伏。不禁为眼前美丽的风光而心旷神怡。第二次与龙泉山结缘是20世纪80年代末，因工作需要我调入位于山南麓的县属行政机关，那时上山览胜、健身十分便利。犹记在夏晚，漫步于山坡小径，晚风徐来，神清气爽。

如今，余姚的区位优势发生了变化，但龙泉山仍似一位智者，它承载着昔日的历史文化积淀，眺望着未来广阔灿烂的前景……龙泉山，是余姚人心中的圣山、浙东文明的高地。

金丝草帽：飘在头上的“彩云”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百年前，欧美国家的派对，常常被云朵般的帽子所掩映。西方的淑女名媛选择夸张的帽子来展示自己的高贵身份，不管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，抑或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，都喜欢戴金丝草帽；无论是法国野兽派代表画家马蒂斯，还是立体主义画派创始人毕加索，都画下了大量戴帽子的人像，其中不乏戴金丝草帽的。

金丝草帽之所以尊贵，首先源于它的材质。草材抽取自菲律宾野生棕榈树叶中的筋，色泽淡金黄，粗细均匀，软硬适中，清洁光滑，富有弹性，韧而抗折，每根长约1.2米，是编织精细物的天然好料。只是太细，编织时比其他材质更费时费神，而细恰又是它的优点之一。

能编织草帽的草材很多，如蒲草、麻、麦秆、咸草、龙须草、稻草芯等至少十几种，而在浙东一带用席草（即蔺草）编帽最常见。如果说这类的草帽多为体力劳动者所佩戴，那么金丝草帽多为有闲的雅士淑女所装饰。

金丝草帽之所以尊贵，更是由于它的精良制作。工序大致如下：拣草（分拣）、检草（检查）、编帽（编成坯帽）、缴帽（编好缴付）、剪帽（剪去坯缘余草）、漂洗、晒帽、磨帽（用磨帽石磨）、烫帽（用熨斗烫平）、修帽（修边）、装帽（包装）。其中编帽是关键环节，需要在千千万万的编帽厂家中完成，而其他工序均在帽厂里完成。

金丝草帽之所以尊贵，还与较高的准入门槛有关。在加工金丝草帽之前，三北妇女多会编织，但会编其他草帽的不一定即获编织金丝草帽的许可。欲编者必须先取得金丝草料的“发放证”（家乡称其为“执子”），凭证到收发站先领取定量的金丝草，编成后上站缴付坯帽。坯帽验收合格，再付劳务费。

我的母亲有双巧手，年轻时与其他村姑一样善编金丝草帽。先父早逝后，家道骤然中落，母亲有6个子女，仅靠她的“小工资”，入不敷出。坚强的母亲白天认真上班，下班忙理家务，晚上打金丝草帽，以补贴家用。她打金丝草帽难免停停打打，不打时就用手巾盖在帽上，怕我们弄脏它。

草帽属草编，草编的历史可追溯到河姆渡时期，甚至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氏。据载，周代已有以莞（蒲草）编制的莞席了，而且当时已有专业的“草工”；汉唐时草编十分普遍，特别是分布在长江流域的草编很具特色。浙江是草编



农妇们喜欢聚在一起打草帽



新帽人向收发站缴帽



位于长河的“余姚私立草帽业小学”

大省，1915年宁波草编工艺品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国际金奖，以后又在国际上多次获奖，这使宁波草编享有盛名。19世纪20年代，宁波金丝草帽开始出口，它成了我国最早进入西方市场的商品之一。

1923年，长河帽商陆志尧从宁波永兴洋行引进金丝草，由陆志尧妻和其他10余个妇女试编，取得了成功。1925年永兴洋行遂将从菲律宾宾购来的金丝草，发放给宁波西乡和长河（原属余姚，现属慈溪）一带妇女编织，果然现出了一批“轻若云、亮似金、细如帛”的金丝草帽，很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。于是打金丝草帽的人增多，本国商人和外商竞相经销。永兴洋行即法商永兴洋行，总部设于巴黎，1869年在上海开设分行，后增设于甬，原址在今宁波永丰桥江北侧的桥堍附近。

傅其霖开设的坤和出口行是上海首家以草帽出口为业的华商。1917年，傅其霖开始与英国客商建立关系，直接对英出口。1925年在宁波城区、海门、余姚设有帽行，草帽出口业务发展迅速。傅其霖，宁波镇海人，曾为第八任上海总商会会董。其他经营草帽业的华商还有联昌、江泰、瑞和、兹丰、福隆等。

宁波西乡在明代时已是宁波最富庶的区域之一，古林、鄞江一带盛产蔺草，蔺草编织特别有名，有“东乡一株菜，西乡一根草”之说。相比之下，当时的长河一带，

土地成陆年代短，可耕地少，穷苦的移民多，没有好的特产，要比宁波西乡贫困。我相信，不是宁波西乡妇女不会打金丝草帽，而是不愿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蔺草产业。而长河人学会金丝草帽编织，如获至宝，成为奋斗的一条门路。

长河金丝草帽很快出现了兴旺的局面。美商中方代理人沈德佑也于1925年在长河开设坤和金丝草帽行。据载，这一时期余姚全县约有2.5万户人家、7.2万位妇女从事金丝草帽为主的编织，年产金丝草帽120万顶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百姓的贫困状态，当时的长河有“十里长街无闲女，家家尽是编帽人”的雅说。

每顶金丝草帽报酬为3—4银圆，折合成大米40多公斤，每位妇女每周能打2—3顶草帽。这对贫苦百姓来说，真是好行当，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或纺织织布的收入。吃苦耐劳的农妇们总是起早摸黑地打，打毕即去缴帽，缴后随即领料，领到立马再打，没有空闲。幼时我去外婆家，每每能看到这番情景，3个舅妈也总是这样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长河草编妇女还用自己的双手“编”出了一所“草帽业小学”，至今仍被称颂。当时，草编妇女深感自己无文化的痛苦，决心要让子女读书识字。草编妇女将打帽赚来的钱，一点一滴汇集拢来，创立了“余姚私立草帽业小学”，它是“草帽人”共同奋斗的历史见证。

“嘭嘭”声里开启的年节

百工

矩 形

记忆中的腊月，是随着各种各样喜庆的声音到来的，其中，便少不了爆米花师傅“放炮啰——”的高声提醒以及随后那一声震天响的“嘭——”。

2018年的第一场雪后，在奉化岩头偶遇做爆米花生意的李师傅。这时节，山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，他们不顾雪后泥泞，纷纷端出筛干净的大米、高粱、玉米、年糕片等来排队。有新过来的村民问：“多少钱一炉？”“10元一斤，我这炉25元。”不待李师傅回应，一旁的其他村民早已喜滋滋地代他作答了。即便排队的人很多，爆一炉需要等上大半天，但村民们毫不在意，趁此机会，大家还能说说笑笑，权当聚会玩乐了。

李师傅选择岩头村的室内菜场作为自己“安营扎寨”之所，时近中午，他的那些家伙什在空荡荡的水泥地上完全铺陈得开。爆米花摊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不停旋转着的“铁葫芦”，底下有红红的火苗舔着“葫芦”胖胖的肚子，被加工物在黑黝黝的内膛里翻转如飞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不过，心思灵活的李师傅早已将传统的手摇式爆米

花机进行了升级改造，他在“铁葫芦”的尾端加装了一个电动马达，只要插上电，就能匀速转动。虽说机器解放了双手，再也不用像老底子那样一刻不停地摇转锅罐，但李师傅也没闲着，他的右手抓着一把火钳，得时不时添点柴火，伺候好炉火，并随时观察压力表，手上的劳保手套都快分不清黑白色了。

“师傅，哪里人啊？”“老家安徽的，干这活也有十几年了。”看上去40岁不到的李师傅，一边瞄了一眼圆形的压力表，一边憨憨地笑着解释道。爆米花最关键的是火候，但光注意“铁葫芦”上的压力表还是不管用，有时候还要凭经验和直觉，如果火候掌握不好，爆出的东西要么还没开花，要么发软不脆。

李师傅的右手边有一个长长的布兜，说话之间，他站起身，把布兜整理了一番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这表示火候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该起炉了。只见他腾的一下拎起黑黑的“铁葫芦”，三两步跨到右侧，把“葫芦口”对准布兜，用一个铁棍用力旋拧罐盖。

“放炮啰——”李师傅爆发出一声响亮的吆喝。周边的人即使有所准备，此刻闻声照样惊心动魄，“哎哎，慢点啊，等我捂上耳朵……”小孩子则一个劲儿往稍远处奔去。

“嘭——”一声巨响，李师傅

瞬间淹没在热气腾腾中。等雾气稍散，看见他正将布兜里的加工物倒进大箩里，呀，喷涌而出的原来是蓬松灿黄的高粱米。它们泛着甜甜淡淡的香，勾起我们对往昔朴实岁月的无限思恋。此时，等不及的围观者可以伸出手抓一把先解解馋。

排在下一炉的应该就是李师傅左手边的年糕片吧，年糕上还撒着星星点点的黑芝麻，出炉后的成品应该也很香很诱人吧。而右侧稍远处的折叠式小桌子上，整齐地摆放着几十袋加工好的成品，这大概是李师傅一早上的成果。有路人经过，也可以直接买上一袋。

出炉那一刻每个人的激动，汇成了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。印象中，爆米花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，每当进入腊月，无数“李师傅”们就带着爆米花机走街串巷，每爆一炉从2角慢慢涨到1元，一家子的柴米油盐钱基本能赚到。那时候，无论城镇还是农村，几乎没有零食吃，孩子们最渴盼的就是每年农闲时爆米花师傅的到来，因为只有那时，又甜又香又便宜的爆米花可以让我们大饱口福。

爆米花是统称，在我们江南地区，最常见的是用大米和年糕片加工而成的。前者我喜欢成把成把地抓着吃，而在春节拜年期间，家乡的习惯是在招待客人的糖茶里放上



李师傅的“铁葫芦”后加装了电动马达,让他省力不少。
(矩 形 摄)

一撮。刚出炉的年糕片酥香甜甜，一片又一片，让人简直停不住嘴。有时为了不让我们吃太多怕撑着，大人会吓唬我们：“吃多了粘肠子！”唬得我们这些小孩一怔一怔地不敢动嘴了，不过，过不了半天，我们又把那句话抛脑后了，继续吃！

爆米花师傅的到来，简直就预示了年节的开启，而那“嘭嘭”的震响，就像新春的序曲，轻松、欢快、热闹中，流淌着幸福的味道。可惜，进入21世纪后，传统爆米花渐渐乏人问津，很多师傅转行的转行，歇业的歇业。这一丢，就是几十年。

“嘭——”今天，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，还能找到儿时的味道、自己的童年吗？

甬城绘·名人故居



屠呦呦故居

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，她的故居位于海曙区莲桥街区域内，这幢门牌号写着“开明街26号”的修缮一新的老房子，是屠呦呦的舅舅——经济学家、曾任甬港经济联谊会会长的姚庆三的旧居，简称“姚宅”。屠呦呦曾在这幢房子里长大。

2015年12月，屠呦呦故居入选宁波市首批历史建筑之列。

(丁安 绘)